



国家安全研究部

盲目、失误 与战争

美中两国引以为鉴

内容摘要

David C. Gompert、Hans Binnendijk、Bonny Lin 合著

This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aracters) of the summary of *Blinders, Blunders, and Wars: What America and China Can Learn*.

有关本出版物的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rand.org/t/RR768。
也可访问兰德公司的中文网站：www.rand.org/zh-hans.html。

兰德公司出版，加州圣莫尼卡
版权所有 © 2016 兰德公司
RAND® 是兰德公司的注册商标。

有限的平面和电子媒体发行权

本文件和文中所含商标受法律保护。本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兰德公司所有，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在网络上发布本作品。本文件仅允许个人复制使用，但不得擅自修改和删节。未经许可，不得复制或以其他方式将兰德公司的任何研究文献用于商业用途。有关翻印和链接授权的信息，请查询 www.rand.org/pubs/permissions。

兰德公司是一家解决公共政策挑战的研究机构，旨在协助推进全球社区的安全、卫生与繁荣事业。兰德公司致力于公共利益，属于非营利性、无党派组织。

兰德公司的出版物未必代表其研究客户和赞助商的观点。

赞助兰德公司

欢迎通过下列网址提供可免税的慈善捐赠
www.rand.org/giving/contribute

www.rand.org

内容摘要

美中两国如果开战，结果可能会两败俱伤。虽然预期代价巨大，令致任何一方都不大可能发动有预谋的攻击，同时也突显了避免因误判而爆发战争的必要性。尽管美中在许多全球性事务上携手合作，但双方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分歧日益严重：中方有收复失地和取得地区领导权（即使不是霸权）的动力，而美方则决心维持区域平衡、安抚盟国并保障公海航行自由。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双方对抗加剧，美方、中方乃至双方都有可能误判形势，继而做出引发危机、甚至战争的抉择，结果双方都得不偿失。这种危险与日俱增。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一个国家为何会错误地卷入战争以及事件原委。

我们研究了八个战略失误案例以及四个无失误案例，结果揭示出一个共同的主题：个人和机构在面对复杂的战略抉择时，依赖于现实—认知模型生成的简化表示，否则错综复杂的情形会令他们不知所措。这些模型与客观现实的差异越大，决策者越容易出错，包括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对自身模型充满信心的领导人和幕僚，往往会漠视或轻视那些威胁——乃至改进这些模型的新信息。由于决策的关键在于利用信息，了解该过程如何失灵或把决策者引入歧途至关重要，而且应该是可行的。

拿破仑的认知模式的缺陷在于他认为，凭借自己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和强大军团，可以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在战争中落败的对手。他那不可一世的自负和宿命论，让他罔顾现实。拿破仑下定决心并说服了他惯于阿谀奉承的手下，遂于 1812 年入侵沙俄，企图迫使沙皇亚历山大进行决战，以将其一举击败。而亚历山大命令军队后撤，引诱拿破仑大军深入俄国广袤的腹地，以严寒、饥饿和哥萨克骑兵的突袭消灭之。拿破仑以为亚历山大会按照他的制胜计划行动，纵使亚历山大也知道这样做会战败。拿破仑应该深谙这其中的玄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军方领导人根深蒂固的普鲁士精神让他们对全面胜利深信不疑，即使西线战事一度陷入胶着。因此，1917年，他们劝说易妥协的德皇威廉二世反对政治家的请求，恢复对美国和其他中立国船舶发动无限制的潜艇战，妄图通过此举围困英国，迫使其投降，因为美军至少要一年后才能抵达欧洲。在德国做出上述决定的几个月内，美国通过反潜护航舰队增援英国，而第一支登陆欧洲的美军部队比德国人预期的时间提早了一年。尽管德国陆、海军指挥官掌握了充足的情报，但他们被完胜的念头冲昏了头脑，没有仔细推敲（牵强的）计划失败的可能性。

希特勒的认知模型包含轻视苏联，雅利安人至上主义，以及笃信自己一贯正确（这可能掩饰了他心底的自卑情结）。消灭苏联让德国人在东方生活、耕种和繁衍的想法驱使着他。他确信在德国国防军的打击下，苏联红军、民众的意志力和政权会土崩瓦解，遂于1941年悍然入侵苏联。他研究了拿破仑犯下的错误，结果又步其后尘。虽然德军在情报和战略上存在失误，但希特勒误判的根本原因是他自己的过分狂妄、以及独断专行。希特勒的顾问团集中体现了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通病：缺少犯颜极谏的人。由于希特勒的失误，“千年帝国”只多存续了四年。

1941年，日本军方领导人推断，待美军从珍珠港偷袭中恢复元气，日军已经征服整个东南亚，到时候可以凭实力谈判议和。在这一推断背后，他们认定日本的种族优越性、军事实力和统御亚洲的命运。警示之声归于沉默。日本人对美国领土发动致命突袭，激怒了这个军事工业实力占突出优势的劲敌，美国上下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对于这个结果，日方早有预料。六个月之后，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夺回主动权，最终打败日本，并将偷袭珍珠港的始作俑者送上绞刑架。

1979年，邓小平认为中国可以教训一下越南，通过短促、果断的侵入，迫使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并打击越南-苏联（反华）联盟。邓小平忽视了越南曾经打退法国、拖垮美国的事实，没有把越南放在眼里。中方的失算没有造成无可挽回的大错：邓小平通过缩短冲突减少了损失，而这场战争暴露出中国军队的弱点，令他得以巩固权力和推动解放军改革。不过，从作战层面看，这场战争不失为中国的一场灾难：中方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未能将越南人赶出柬埔寨。

同年，苏联领导人认定实施有限的军事干预，支援阿富汗政府军，可以迅速结束混乱的政局、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美国的图谋。他们的认知模型盲目相信军队，忽视了预示军队这次会失利的情报。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了阿富汗的各大城市，就可以平息该国的局势。尽管军方高层曾警告称，红军未做好镇压叛乱行动的准备，苏联领导人却低估了对手的实力、狂热、毅力、以及出乎莫斯科意料的战斗方式。苏联红军很快陷入与叛军的直接战斗，而由于苏联干预，叛军的规模快速壮大。直到十年之后，红军才撤出阿富汗。苏联因为战争支出、人员伤亡、以及被国际社会孤立而元气大伤，不久便土崩瓦解。但在决定军事干预的时候，威吓成习的克里姆林宫看不到上述潜在的风险。苏维埃驻外官员和特工发出的预决策警告被压制或忽视，军队领袖也无奈凡事由政治局拍板。

1982 年，阿根廷军事独裁者决定占领英国的福克兰群岛，企图通过激发阿根廷人的爱国心扭转在国内地位的下降。军政府的认知模型完全不切实际。首先，在所有人中偏偏认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会派遣英国军队夺回群岛，又假设美国不会支持英国。军方领导人依赖外交官分析英国可能的反应，而与英国多年冷战造成的挫折和愤慨影响了外交官的客观判断。结果与军政府的预想恰好相反：阿军被强行驱逐——堪称国耻，英方更坚定了捍卫福克兰群岛的决心，一时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应，迫使军政府下台。阿根廷人一度十分肯定英国不会出兵，因而驻守部队没有战斗准备；最终，面对英军迅速投降。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之后，气氛骤然紧张，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找到了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进而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制度的原型的机会。乔治·布什总统及其助手曲解了粗略的情报，事实证明，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并且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情报是错误的。为避免开战的决定受到质疑和阻滞，美国当局更无视关于入侵伊拉克后的风险和代价的警告。美国对伊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人员伤亡、财富损失、地区不稳定、全球形象减分、以及分散打击基地组织的注意力。而伊拉克仍然宗派冲突不断。

上述案例显示，决策者在下列情形下特别容易错误地发动战争：

- 情报被忽略、过滤、曲解或操纵以迎合特定倾向
- 过度依赖直觉和经验

- 傲慢、以自我为中心或狂妄导致盲目自信
- 僵化而错误的战略构想或愿景占上风
- 不考虑意外情况
- 低估敌人的意志或实力
- 低估作战难度或持续时间
- 压制异议和争论。

在上述导致战略决策失当的原因综合作用下，决策者会过度冒险。浮躁的领导人及其亲信对他们掌控未来的能力太过自信，甚至到了以为敌人会乖乖听从摆布的地步。在这些情况下，决策者比普通人更倾向于冒险。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即非常成功的人对其掌控局面的能力盲目自信，而且也吻合芭芭拉·塔奇曼在《“荒唐”进行曲》中的观点：集中的政府权力不仅酿成腐败，还会导致不良的思维方式。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相比客观现实，战略误判与有缺陷的认知模型的关联性极强。那些犯错者本该更了解情况，因为当时似乎有相关信息可改善他们的认知模型，支持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相比之下，当做出正确的选择时，例如，伍德罗·威尔逊在 1917 年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亨利·基辛格处理 1973 年美苏对峙的方式、苏联在 1982 年决定不出兵波兰摧毁团结工会，决策者会充分利用手头的信息，因而基于健全的现实认知模型行事。即使进入二十一世纪，决策者可获得的情报和其他信息量呈指数级增长，准确性也显著提高，但犯错的倾向仍挥之不去，这印证了我们的观点：信息使用不当是罪魁祸首。

所以，需要改进领导人和机构运用信息的方式，以便他们的认知模型反映客观现实，进而能够做出合理的选择。虽然这个解决方法在理论上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绝非易事。领导人囿于自己的认知模型，可能不愿承认他们会过滤（更别说扭曲）信息以迎合其倾向和意愿。在这方面，他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更愿意选择支持自己既有观点的信息。决策者越是自信，越是认为自己果断，就越不会接受预示他们错误的迹象。然而，也许更明白事理的机构和顾问必须依赖领导人，故不愿犯颜直谏。我们的案例一再表明，对这些盲目的决策者的制度性约束要么缺失、要么太弱，无法预防其犯错。

为降低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政府需要独立的政策分析和意见来

源，至少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是这样的。有关顾问必须无利害关系，但能够直接接触到决策者。（不能指望军方领导人，因为他们受文官控制；也不能指望情报官，因为他们不应该参议政策。）在美国，这种独立来源或许是那些能获取一切相关信息且研究分析能力最强的战略顾问机构。此类机构可以而且应该划定任务边界，只有在需要独立评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才启动，不需要、也不应该设置自身的官僚制度。实际上，许多总统都曾经运用红队研判法 (red teaming) 和魔鬼辩证法 (devil's advocacy)，战略顾问机构是将这种普遍的特别做法制度化。

战略顾问机构适合设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下属单位，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接近总统，而且其法定职责是“评估美国有关……实际和潜在军事力量的目标、承诺和风险”。从政府之外获取最高质量的公正分析支持，是最好的做法。该机构虽然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但负有在决策之前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他部门提供客观分析的义务，具体任务领域包括：战略理论、目标、假设、敌方实力和意志、实施障碍、成功的机会、政策选项、以及意外情况。无论这些意见是否重申现有的政策，总统都有义务听取。虽然在行政特权的范围内，但该过程应记入历史档案，公开档案尤佳，以便加强问责制。

同时，政府应当制定并恪守分析客观性和严谨性的标准——类似于质量保证的最佳做法，至少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时应当如此。分析应当完整、平衡、合乎逻辑、有证可循、可复现、并记录在案，而本研究列举的八个失误案例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最终的好处是促进决策者客观地运用信息，从而使其认知模型符合现实。独立的战略顾问机构将是主持上述标准的天然人选。

对于战略顾问机构、乃至主流研究机构，影响战略决策的分析研究应当利用分析师 + 电脑组合所展示的优势。借助现成的技术，探索决策者及其顾问根本预想不到的任何假设情形变得相对简单，这样做是为了正视不确定性，而非从旁假设。此类方法和工具可以让决策者和分析师探讨复杂因素，而简单化的认知模型做不到。对于运用计算机来改进战略分析和决策，他们有可能产生文化和心理上的抗拒，不过这是可以克服的。许多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已借助先进的分析工具进行探究，没理由把战争与和平问题排除在外。

这些教训和解决方法如何应用于中美两国的情况？这种情况甚至比本研究提及的任何历史案例都更加复杂，原因有二：首先，中美双方的决策者可

能都在依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客观现实的认知模型，彼此强化，从而提高了误判引发危机的概率以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 中方倾向认为，随着国力的不断壮大，中国有能力收回以往国力衰弱时沦丧的领土，并且成为东亚地区的领袖。但是，在他们眼中，美国想要阻挠中国的合法主张，维护自身的地区霸权。为此，美国在西太平洋驻扎进攻性部队和维持盟友。这种认知模型对美方关于无意围堵中国的保证持怀疑态度。与此同时，中方决策者可能低估美国因为不甚重要的问题动武的意愿，同时又高估自己在冲突发生时掌控局面的能力。
- 美方倾向从中国的领土主张和持续加强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 (A2AD) 能力推断，中国拟通过威吓、必要时动用武力取得地区主导地位，而这势必危及美国的利益、盟国的安全和区域平衡。美方可能低估美国的攻击力量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程度，以及现有的同盟和新型安全关系让中国产生被包围的恐惧。然而，与中方一样，美方可能也高估了自己在冲突发生时掌控局面的能力。

中美两国决策者各自的现实认知模型可能导致不良的战略选择，但双方本身似乎不存在深层次的缺陷，例如，无限制的自负、盲目的阴谋诡计、轻蔑对方、笃信纸面推演、倾向冒险、或者厌恶争议和相左意见——许多历史大错的肇因。然而，这些不完善的模型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或将削弱经济相互依存等遏止中美开战的抑制因素。双方军队在西太平洋近距离对峙，并且都崇尚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战略，这可能会加剧上述危险。

此外，还有另一种风险：第三方——也许是日本或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可能在领土争端中鲁莽行事，导致两个大国交锋。总而言之，因误判导致中美冲突的危险似乎正在上升，但是不必惊慌。鉴于事关重大，这种危险不容忽视。

在此情况下，相较历史上的失败案例，两国政府和社会持续开展坦诚的沟通，是促使认知符合现实的最佳方式。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在峰会和热线之外建立其他沟通机制。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在白宫与唐宁街之间的联系，是一个较好的榜样。显然，要考虑到美中两国并非盟友，无法完全向对方开

诚布公。定期和坦率的沟通可以增进对彼此的忧虑、目标、看法和问题的了解，促得决策者的认知模型更贴近客观现实。当然，如果战略互疑在和平时期得到处理，也有助于危机管理。中方对于如此密切的高层接触或心生警惕，那么，美国领导人应该耐下心来、坚持推动交流，但这不表示美国在这方面的需求比中国更加迫切。

在美国的推动下，美中两国现已建立一个名为“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论坛，论坛每年举行内阁级会议，讨论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各种议题。双方必须在该机制以外增设其他的官方沟通途径，倒不是因为对话机制不成功，相反其前途光明。国家安全机构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对促进合作和加深了解都至关重要。军事交流显然非常重要，但尚未形成固定机制——主要是因为中国军方过度警惕。美方应当继续施压，扩大两国军事关系，以期避免误判和可能的敌对行动。虽然双方都会尽力从官方和军事接触中收集情报，但这又有何妨：中美之间，彼此知根知底，方可化解潜在的危险；若彼此一无所知，则陡增隐患。

非政府交流也应该加强，特别是中美战略圈（智库、大学、退休官员和军官）的交流。双方在该领域已开展大量交流，但再多也不为过。一种特别有价值的做法，是举行联合危机“博弈”并从中总结学习，参与者主要是了解美中两国领导人和机构的思维方式的非官方人士。此外，由于中美决策模型的根源在于民众的互疑，应当促进各种形式的教育交流。

更广泛的中美沟通，从将级军官到普罗大众，可能都不足以消除战略互疑，因为两国存在无可否认的分歧，不单在客观世界的认知方面，还包括现实利益，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但对任何一方来说，这些分歧都不值得付出冲突的代价。因此，除了深入沟通，两国政府必须在落实上述建议之余，确立常规的决策保障措施。

历史警示：不可低估领导人和机构错误地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为谨慎起见，我们不能确肯定，中美之间慑于后果严重不会开战——因为如果开战，很可能是误判的结果，就像以往反复演绎的错误那样。善用信息，有可能改善决策和避免犯错。中美双方都有机会和责任避免重蹈历史之覆辙。